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翻译学理论系统 整合性研究

A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Study
of Translatology

曾利沙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翻译学理论系统 整合性研究

A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Study
of Translatology

曾利沙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 / 曾利沙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1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135-5497-8

I. ①翻… II. ①曾… III. ①翻译学—理论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864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赵东岳

封面设计 覃一彪 孟耕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5497-8

定 价 59.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54970001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40065】的资助。

同时受到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编委会

顾问：桂诗春

主任：刘建达 董燕萍

编委会成员（按汉语拼音排序）：

陈建平	董燕萍	杜金榜	何晓炜	黄国文
李绍山	李行德	刘建达	亓鲁霞	冉永平
沈家煊	束定芳	王初明	温宾利	文秋芳
吴旭东	徐海	曾用强	章宜华	郑立华

总序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策划出版的一套丛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列入学科目录，并开始逐步在我国建立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圣经》“通天塔”故事到今天网络的蓬勃发展，都说明语言和语言交往（包括语言的习得和教学）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也预示着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强大生命力。语言和人类生活休戚相关，往往被称为人们身边的科学。每一个人都有学习和使用语言的经验 and 体会：就怎样使用语言而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大都可以判断哪些话可以或不可以这样或那样说；就语言习得而言，每一个没有生理障碍的人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过程，最后都学会了说话。至于怎样学另一种语言，大多数人都有一些自己怎样学习的门道，有自己的话语权，可惜的是学习的结果似乎没有母语学习那么简单和显而易见，而是有成功有失败。这里面有些什么玄机呢？Dave Willis (2003: 1-6) 在他的近著里指出：作为教师，我们看到学习是以一种难以预测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所教的东西不一定是【学生所】学到的东西**” (What is taught may not be what is learnt)。而学生往往又会学到一些不是教师所教的语言现象。他曾做过一个小试验，把一个在职的师资培训班里的教师分为两组，让它们分别列出一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最常犯的10种英语失误。事后再把失误加以比较，发现有7种竟然是完全一样的（例如不会使用冠词、第三人称动词的现在时态，不会使用do 助动词来提问，等等）。这自然引起一些关于课堂教学的严重问题：教师是否真正用了2年时间才能减少3种失误？是否3年级学生并不比1年级学生好多少？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可怕的失败？Willis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发人深思，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学习者在学外语的时候面临着和母语习得很不相同的问题，包括语言学习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策略、注意、智力、情感、学能……等等因素。学习者的这些差异性在不同时候会在学习者的个体身上产生不同的

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实施教学的一方(从教育部门的领导者、组织者到教师等)往往以为“所有的受教育者都是一样的”(Skehan, 1998: 260-261),因而忽略了他们的差异性,只顾制定和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提出统一的要求;连教师的培养都是为了“巩固这些隐含的权力关系”。

这个例子说明,应用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科学,必须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教育学等角度去综合解决语言教学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现再从语言学中的语言起源这一个特殊问题来说明其多学科性。大家都知道,巴黎语言学会曾于1886年明令拒绝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因为虽然这个问题曾经不断激发许多代人的想象力、兴趣和注意,但是所有的研究都陷于无休止的、无结果的思辨性讨论。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脑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共同协作,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哈佛大学心理学家Hauser、Fitch和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哲学家Chomsky(2002)在*Science*所发表的他们的语言机能新观(语言机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狭义语言机能则只有递归)就是基于这些研究。在文章里,他们提出语言进化的比较方法——根据现存物种的实证性数据来详细地推断灭绝的先祖。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Pinker和Jackendoff(2005)是他们的对立面,也提出很多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并不反对语言机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对Hauser和Fitch关于别的物种语言的相似性(analogs)和同源性(homologs)的研究表示赞赏。但是他们坚持主张语言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也同样是在多学科背景下展开讨论。并非针对Hauser等人的文章,而单独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和交际起源而展开富有成果的研究的,还有哲学家Dan Dennett(1995)、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1976)、Peter McNeilage(2008)、人类学家Gordon Hewes(1973)、进化生物学家Robin Dunbar(1997)、发展心理学家Michael Tomasello(2008)等。

正是基于这种秉承“质量高、彰显‘新’”(新议题、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等)的理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组织了这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第一个系列有4本著作,它们是《英汉双及物结构的生成语法研究》(何晓炜)、《计算机化考试研究》(曾用强)、《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徐海)、《词汇语用探新》

(冉永平)。从这几本新著来看，篇幅都不是很长（十多万字），但却要言不烦，有血有肉；少的是泛泛之谈、言不及义，多的是个人的实际观察和亲自试验。而且选题得当，又经过爬梳剔抉、信而有征，对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该系列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希望通过第一系列的投放，能够吸引更多的作者的注意，踊跃支持该套丛书，使我国语言学研究能够绽放出更多的奇花异草，春色满园。

桂诗春

2011年8月

序

曾利沙教授是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国内最早招收应用翻译方向研究生的博士生导师。我参与主持的“全国应用翻译理论研讨会”最近几次都请他作主旨发言。在“第三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北京，2009）上他的主旨发言的题目是：论应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的概念表征；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海，2011）上的题目是：从语境参数看范畴概念“活动”英译的虚与实——兼论应用翻译研究的经验模块与理论模块的建构；在“第五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西安，2013）上的题目是：应用翻译理论范畴构建与拓展的方法论。以上发言稿均在《上海翻译》发表过。这一时期，他还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系列论文。他的研究引领国内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独树一帜，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曾利沙教授的这本《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专著是他多年研究的深厚积淀。从他已发表的文章中虽已略知端倪，但这是翻译学的整体性研究，亦是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上层研究，高屋建瓴。读罢大作，方知作者的研究思想又有提升。

曾利沙教授的《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以其学理性基础（第1章）为发轫；以对翻译学的意义理论、范畴理论和研究取向的认识论、价值观为哲学基础（第2章至第4章）；以译者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研究的阐释、描写、拓展（第5章至第7章）为阵地；最终凝成了总结性的“翻译学理论逻辑范畴体系的整合与拓展”（第9章）。本书宗旨是对现有翻译理论范畴进行重构，以基础逻辑范畴体系为立论基础，对应用逻辑范畴作整合和拓展，形成开放性的理论范畴体系。本研究的创新和教益良多，我感触颇深的有以下方面。

一、哲学的整体观

总体来说，我国翻译研究中哲学思维比较薄弱，感悟强于思辨、生命体验强于逻辑分析。但曾利沙教授哲学思考贯穿他的研究，逻辑分析成主流，彰显语言哲学、逻辑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从现象学、阐释学等不同的角度或解释翻译活动的现象，或给翻译理论研究以形而上的启迪，

全局筹划。

本研究的意义理论、范畴理论和研究取向基于厚实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基于实践的对客观事物的能动的反映过程。曾利沙教授从“经验”和“理智”相统一的认识论出发，围绕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性、范畴化、逻辑论证和区间规律性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价值观是对所作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本书第4章从价值哲学观入手，专门论述了“价值特征论是基于实践的翻译学原则理论范畴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认为“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研究客体的价值属性”，并以目的一需求原则、策略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相互关系，以及翻译实践选择行为为例对宏微观层面的价值论作了解析。曾利沙教授将哲学的方法论用于翻译学整体体系的建构：“体系的科学性在于要求它具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逻辑范畴体系；体系的逻辑性体现于各理论范畴的相互联系、相互推论、相互印证性；体系的学理性要求对基础理论概念、核心理论概念、外围理论概念和辅助性理论概念（保护带）的结构要素性进行梳理，明确自身的理论目标、理论特点、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次范畴化的结构体系”（见前言）。

二、宏一中一微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摆脱了二元思维定势。采用宏一中一微的方法论有利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桥接，平衡综合和分析的运用，便于描写、解释和揭示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从策略上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宏一中一微理论范畴的互动和联系，系统中同一层次概念的整合和拓展使整个系统纵向贯通、横向连缀。

本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技术理论范畴”。这是保证宏一中一微系统上下贯通的中介物，其核心内容是“理论模块”和“经验模块”的建立。在翻译理论宏一中一微的系统研究中，模块的技术理论居中，它既受宏观理论的指导，又受微观技巧的检验，是宏观理论通向翻译实践、开展微观技巧研究和指导翻译实践的中间环节。

三、理论联系实践

曾利沙教授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向最明，无论是哲学层面，还是技术理论层面，都植根于翻译实践。曾利沙教授说：“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源自于主体对客体及其环境条件关系的认识，……从学理性看，只有将各种有关主体和客体的经验感性和理论感性认识上升为理论理性，即将其整合在一个开放性的逻辑范畴体系内才能统筹兼顾性地解释复杂

而丰富的翻译实践”(见前言)。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曾利沙教授多用实例来佐证,或通过翻译模块“中间物”来桥接,抵达翻译实践的彼岸。

反观某些翻译理论,往往只强调理论的认识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对翻译实践无补。从报刊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不同专业、不同界别的学者拿翻译说事,对译事发议论、做研究,都想解开翻译这把锁。两年前,我有位学中文的朋友突然对翻译产生兴趣,看了几本有关翻译的书和一些文章,写下了谈翻译的归化/异化的研究心得,笔法上没有破绽。一个既不做翻译,平日里也不搞翻译研究的人,居然凭他的学养、思路 and 判断,畅谈对翻译的认识,写出基本靠谱的文章。更不用说我们外语圈内搞语言的、搞文学的客串翻译研究了。这可算是由翻译概念的泛化带来翻译研究的泛化,当然不全是坏事,起码可提高认识。不过,要触及翻译本质,要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还是要有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翻译理论。

四、创建模块理论

曾利沙教授在宏一中一微相统一的系统性研究中,找到了理论联系实践的中介物——技术理论范畴,创造性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开放式经验模块与理论模块,即在实践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实践客体的区间形成认识结构、实践结构和方法论结构的统一。模块理论以大量实践研究为基础,以典型的译例进行归纳整理,具有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提出技术理论范畴拓展的可行性——开放式理论模块和经验模块建构法,在本专著中以“引申法”开放性技术理论范畴为例。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发表过有关翻译引申的文章。文章从常见的局部经验出发,归纳了几种引申的现象,列出了几条规定性原则。但从模块理论来看,这种归纳只是局部的、初步的,不能覆盖翻译引申的普遍现象,即没有上升到技术理论的高度。局部的、分散的归纳与整理,其效度和信度远远不及模块的效度和信度,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翻译技巧只有启示和示范意义,没有实用价值或操作意义的原因。

此外,本研究重构了译学系统的理论形态,提出新的现代译学研究“示意图”,具有科学研究的学理性价值。又如,在第6章“主体性艺术创造典型体现的可描述性”中提出“译眼”的新概念。“译眼”来自“文眼(literary eye)”——最能体现文学创作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译眼指译文恰如其分地传达“文眼”的美学特征、再现“文眼”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的语言形式。

总之，本研究深邃的哲理与典型的实例共现，创新的译学思想与具体的操作并存。我们期待本研究的另一组成部分，即“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拓展与整合”，早日面世，以飨读者。

方梦之
2014年春节于上海梅城

《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序

《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以下简称《整合性研究》)是曾利沙教授的又一部力作,也可以说是其2012年出版的《翻译学理论多维视角研究》的姐妹篇。十分明显,《整合性研究》大大超越了《多维视角研究》。该书从逻辑范畴体系建构的研究路向出发,以问题—解决模式为理论发生论,从桥接宏—中—微观理论范畴的经验模块建构入手,结合语境参数理论通过典型案例“逻辑引申法”的分析,不仅探讨了翻译学“技术理论范畴”的研究方法,而且融通了现象学、阐释学、逻辑学、价值哲学、系统论、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观,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与拓展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概括地说全书是对现有翻译理论范畴进行重构,将其整合于以基础逻辑范畴体系为立论,以应用逻辑范畴为两翼拓展的系统框架内进行阐释,并予范畴化拓展,形成开放性的理论范畴体系。可以说,这部《整合性研究》专著是当今学者对翻译学及其分支翻译学的理论建构的突破性发展,真是可喜可贺!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共十三章。第一部分,为“翻译学理论范畴系统整合性研究”,包括第一至第九章,分别论述了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问题。每一章里都分别指出其立论目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学术内容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基本思想。

例如,第一章论述了“翻译学基础理论概念研究应明确学理性要素”;第二章论述了“现象学视角下意义充实理论问题的可证性”;第三章论述了“翻译学理论体系应具有逻辑范畴体系的可推演性”;第四章从价值哲学观入手论述了“价值特征论是基于实践的翻译学原则理论范畴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第五章讨论了“译者主体性与意义形态的语境化再现与表现”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第六章从可证性角度讨论了“主体性艺术创造典型体现的可描述性”,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典型性问题;第七章从实践主体论哲学观入手讨论了“翻译主体性理论研究范畴体系拓展应明确其内涵与外延”问题;第八章讨论了“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体系拓展”的原理与方法(主要由利沙教授的博士生杨洁撰写);第九章论述了开放性“翻译学理论逻辑范畴体系的建构与整合的可行性”问题。作者认为,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源自于主体对客体及其环境

条件关系的认识。作者以大量的篇幅,阐释了复杂而丰富的翻译实践以各种语言文化差异、认知思维差异、社会历史影响等制约因素使得翻译行为所追求的理想形态面临多种选择,而任何选择都有其特定的理据和所从属的逻辑范畴体系,因而才能统筹兼顾地充分解释复杂而丰富的翻译实践。书中梳理了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特点、方法和有关翻译理论体系的观点,并对其理论局限和不足进行了评述。在科学方法上强调研究的可阐释性、可描述性、可推论性、可印证性和可操作性。在综合书中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的基础上,用简明的图解方式整合并拓展出“开放式翻译理论逻辑范畴体系”。作者在其逻辑范畴体系中,从始项范畴、基项范畴、中项范畴、终项范畴出发,又拓展出四大子项范畴:“文体特征范畴”(始项范畴)、“文本义一意论范畴”(基项范畴)、“价值论范畴”(中项范畴)、“区间规律性范畴”(终项范畴)。各项范畴之下,都有其主要而清楚的研究内容,例如,终项范畴,主要研究“可操作准则与规则论”、“方法技巧论”、“译者主体论”、“译者主体间论”、“译者规范论”。这些从经验走向理性,又从理性回归经验实践的路径,是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由于作者把握住翻译研究的总目的,又擅于将各分目的阶段中所把握的课题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多维度、经验性的研究,从而上升到“以类度类”和“以道观之”(荀子·非相)的思想境域,使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得到升华,即理智地形成原理、原则、准则、方法、技巧等理论范畴体系认知。这一系列开放式经验模块和理论模块,形成认知结构、实践结构、价值结构和方法论结构达到融会贯通的统一。这些理论成果,对解释复杂的翻译现象和解决翻译实践问题,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全书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意义阐释理论整合研究。这部分的四章同前面九章的逻辑思维一样,按照分章顺序来说明每章的研究立论、研究理据和研究方法。例如,第十章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本体论意义阐释框架”,提出“主题与主题倾向”、“历时性社会文化语境关联”、“认知语境结构链”等理论,解析了古汉语诗词本体论意义、批评的阐释框架及其运用的描述方法。第十一章论述了“历时社会语境下的主题及其倾向关联性融合”,阐明诗词之意统摄于情,情受制于诗人的历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社会关系与情感经历。第十二章讨论了“历时性社会文化语境制约下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由杨贵章博士执笔)。阐述了古汉语诗词微观意象内涵往往受其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所统摄,其情境相依,意随情转,境转情变。第十三章讨论了“阐释之循环

之于古典诗词英译解读的方法论”(主要由利沙教授指导的访问学者吴慧坚教授撰写)。以上四章分别结合金晶绪的《春怨》、张继的《枫桥夜泊》、《虞美人》(宋词)、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孟浩然的《春晓》和李清照的《声声慢》等诗词英译的不同版本和不同解读,引入钱钟书提出的文本理解“阐释之循环”思维,拓展了对古典诗词英译解读的艺术性与理论性。

以上是笔者先睹为快,对《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以下简称《整合性研究》)作了一个扼要介绍。我想广大读者从中不难看出该书的研究内容、深刻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的现实意义。这里,笔者仍想再发表一点浅见。

其一,《整合性研究》的学术性价值,值得我们共同来高度关注。是对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突破和拓展,即对翻译系统理论形态的研究和重构,是全书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译坛一大亮点。多年来,古今中外对翻译学的研究,都花费了许多精力。远的不必多说,1995年图里(Gideon Toury)依据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说明,勾画出“翻译学”结构图。翻译学派研究创始人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框架曾把描写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前者指导翻译研究,后者指导翻译实践。“但应用理论在霍尔姆斯的分类法中却没有位置”(参见《中国译学大辞典》2010: 54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坛引进和讨论过的国外译家,不下数十位。《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杨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2),展示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原貌,精确地分析了它在“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中国学者也从来没有寂静过,一直非常活跃,国际翻译家联盟论坛(FIT)会上,每次都少不了中国的声音。在国内,翻译界更是活跃。有的认为翻译学需要建立一种“范畴界定清晰、前后一致、逻辑严密”(杨自俭)的体系。谈“翻译学”的专著,就不下百余种。例如,《意态由来画不成?》(翁显良)、《翻译的艺术》(许渊冲)、《翻译:思考与试笔》(王佐良)、《翻译学》(谭载喜)、《科学翻译学》(黄忠廉、李亚舒)、《变译理论》(黄忠廉)、《翻译论》(许钧)、《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王宏印)、《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郭建中)、《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刘宓庆)、《余光中谈翻译》(余光中)、《文学翻译原理》(修订版,张今、张宁)、《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张美芳)……不胜枚举。无疑,这些专著和宏观原理认知对建构翻译学进行翻译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整合性研究》在肯定了前人和当代学者所作的贡献和积极

努力的同时，又更进一步加强了哲学思想的指导，提升了逻辑思维的能力。该书所认知的“体系”、“范畴”不是从唯原理出发，而是遵循“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的。

其二，《整合性研究》是在翻译学理论与翻译学实践相结合的大视野下所进行的一种创新性研究，其方法论特色，也应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译坛许多学者对翻译方法论问题进行的研究，之所以受到译坛的重视和欢迎，就是因为在培养翻译人才上有其特别需要。有些青年学子在选题、开题上感到困惑，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指导偏少、或指导不力、浮躁风刹不住、有的不读书、少读书或读书不求甚解也是不无关系的。现在我们从利沙教授近年来的论著和对博士生的指导上，能得到一些有益启示。他的翻译学理论范畴体系建构、拓展与整合的哲学基础和从应用翻译学理论范畴体系的建构、拓展与整合，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是宏观与微观思想有机的统一。系统理论研究既考虑到它的知识性、结构性、层次性、预测性和范畴化，又考虑到它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开放性。作者以大量的实践研究为基础，进行典型译例的归纳与次范畴化，建构起“经验模块”和“理论模块”，拓展出“技术理论范畴”，就是突破传统宏观纯理论与微观翻译实践相脱节的局限性，这一“理论桥接”的创新意义，受到了学者同仁的鼓与呼，就不言而喻了！

其三，《整合性研究》是在中国学术“走出去”面临挑战、机遇与美梦成真的大好形势下，即在羊年到来之际就要面世了。我国译坛学者的探索意识历来是很强的，在大家追求学术创新的大好形势下，如何更快地摆脱传统的认知模式，敢于提出中国译学理论研究新模式；如何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视角切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从而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启发；如何认识翻译研究发展的方向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对翻译研究的综合素质有哪些必须的要求；译学领域的博士生如何学研结合；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如何对近十年、近百年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成果和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特征的话语体系、学术规范和学术理念，“走出去”热情地开展交流，……凡此种种，都十分重要，也很有意义。

最后，笔者还想重复地说，拓展翻译学研究，关键在人才。翻译人才培养主要在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如何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加强译才培养，十分重要。中国译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原创性不足，学术专著外译和学术语境的移植问题，值得同仁们特别关注。做好了这些基

本工作，就更有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用中国声音说出中国道理，就更容易畅通中外沟通渠道，这就需要我们全国学者携手、共同努力。

总之，在马年春节里读到《整合性研究》，感到心情舒畅，愿马年吉祥如意，常与同行共勉励。

是为序！

李亚舒

2014年2月于中国科学院